

## 一 开启德赛之蒙 再造青春之国

当你在晴空丽日下伫立于宽阔雄伟的天安门广场，当你在风雪弥漫中走向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那一瞬间，你一定会想到很多很多，很远很远；一定会想到在那豺狼当道，国难深重的黑暗年代，曾经有3000多名青年学生冒着被捕被囚的危险，冲出校园，在这里集会、游行，展开了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——五四运动。五四运动的爆发，犹如一束闪电，一声惊雷，震撼了偌大的中华古国，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—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。

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划时代的历史作用，它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，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。作为一场政治运动，从1919年5月4日开始，“内除国贼、外抗强权”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

结和动员起来，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，到 6 月 28 日，斗争的直接目标——惩办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輿三个卖国贼和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，得以实现，而告结束。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，则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，从 1915 年 9 月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，一直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结束。这本《五四运动史话》，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写起的。

## 1. 陈独秀与《新青年》

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（新青年）杂志的创办为标志。（新青年）1915 年 9 月创刊，原名《青年》，因为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《上海青年》名字雷同，从 1916 年 9 月 1 日起，正式改名为（新青年）。

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创办者是陈独秀。“陈独秀”这个名字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是非常响亮的。人们听到陈独秀的大名时，无论是高兴也好，痛恨也罢，都像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如雷贯耳。”

陈独秀字仲甫，号实庵，安徽省怀宁县人，中等身材，肤色黝黑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操

一口浓重的安庆口音。1879年10月9日出生。2岁时，父亲病逝，随祖父学习四书五经。17岁中秀才。1901年，22岁的陈独秀自费到日本留学。1903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《国民日报》，主张民主革命，反对君主专制。《国民日报》停刊后返回安徽。1904年在芜湖编辑《安徽俗话报》，宣传反帝爱国，启迪民智。次年任教芜湖安徽公学期间，组织半军事性的秘密组织岳王会。20世纪初年参加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，袁世凯窃国后，参加反袁斗争，斗争失败后再度出走日本。在日期间，曾协助章士钊办（甲寅）杂志。1915年夏回国。

当时的中国，内忧外患日甚一日。袁世凯政府对外投降卖国，对内加快复辟帝制步伐。1915年5月25日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“二十一条”草约。8月，成立筹安会，公开鼓吹帝制。各省袁氏亲信纷纷递交“请愿书”，要求变更国体。12月12日，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，改国号为“中华帝国”，定年号为“洪宪”。与此同时，在思想文化领域，封建复古派们大肆活动，积极配合。尊孔读经，鬼神迷信之说，甚嚣尘上。辛亥革命带来的一点点民主空气被扫荡一空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政治上失败后，在思想文化战线也遭到了惨败。这一

切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压抑和痛苦。他们开始致力于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改变现状的新出路。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陈独秀，首先发难，于 1915 年 9 月创办《新青年》，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，向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，展开了猛烈的攻击。

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杂志，辛亥革命失败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。他认为，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，原因就在于中国在进行政治革命前，缺少一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。几千年来存在的封建思想、文化、伦理、道德根深蒂固，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。他说：这腐朽陈旧的思想布满中国的一切角落，所以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巩固共和国体，非复将这些反对共和的伦理、文学等旧思想，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。因此，中国思想界的当务之急是扫除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、旧道德，代之以新思想、新道德，扫除得愈彻底愈好。这是陈独秀对辛亥革命失败所作的一个有益的总结，也是他创办《新青年》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原因。

为了实现办杂志的愿望，陈独秀曾找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，请求资助，但亚东图书馆经费困难，无力承担印刷发行任务。后经汪孟

邹介绍，得到了汪的同业老友陈子沛、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的帮助，1915年9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终于问世。

《新青年》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，每号约100页，6号为1卷。它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。1917年1月，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，通过《新青年》杂志了解到陈独秀的思想，对陈产生敬佩之情，遂致函陈独秀，聘其为北大文科学长，同时应允将《新青年》搬到北京大学来办。陈欣然应聘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便由上海移到北京，地址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的家中。

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“兼容并包”的方针，许多新文化人物被聘请到北大。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时，刘半农也进入北大文科；钱玄同、沈尹默在此之前，就在北大文科任教；胡适在1917年夏天从美国回来后也到北大来任教。李大钊1917年11月到北大，次年任北大图书部主任。鲁迅当时虽没有来北大任教，但由于长期在教育部工作，又因为和《新青年》的关系，因而同北大的这些教授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
《新青年》创刊后，开始一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（从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至

第 3 卷第 6 号 1917 年 8 月 1 日)。从第 4 卷第 1 号 1918 年 1 月 15 日起，改为同人刊物，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，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。编委会由 7 人组成，他们是陈独秀、周树人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胡适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。编委轮流编辑，每人一期。到 1919 年 12 月编辑第 7 卷第 1 号时，又由陈独秀主撰。以后不久，陈南下返沪，编辑部又迁回上海。1920 年 8 月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，《新青年》从第 8 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，直到 1922 年 7 月 1 日出版了第 9 卷第 6 号后休刊。

《新青年》从创刊到休刊，其间有 7 个年头。这 7 年是中国知识分子、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，是新旧思想激战的年代，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。《新青年》适应了时代的要求，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，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。

毛泽东曾说过：《新青年》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，由陈独秀主编。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，我特别爱好胡适、陈独秀的文章。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，一时成了我的模范。

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：《新青年》像春雷初动一般……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，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，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，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，心中就产生了叛逆的种子，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，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。

恽代英等人致函《新青年》说：我们素来的生活，是在混沌的里面。自从看了《新青年》渐渐地醒悟过来，真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，我们对于做《新青年》的诸位先生，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。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，就发了个大愿，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，于是就办了《新声》半月刊。

总之，《新青年》创刊不久，就被誉为“青年界之金针”和“良师益友”，在青年知识分子以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。陈独秀也因为创办《新青年》而赢得极高的声誉。

## 2. 德赛二先生

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的影响，以至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动的标志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《新青年》在

辛亥革命遭到失败，复辟帝制逆流最猖獗时，针对中国民众思想愚昧、落后的状况，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，即德先生（Democracy）和赛先生（Science），启发国民的民主主义觉悟，向一切封建的伦理道德及政治、文化、宗教进攻。正如《新青年》明确宣告的那样：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。

这在当时的中国，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。

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将近 80 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，在中国形成了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，因而中国人从来就与民主无缘。在《新青年》创刊之前，中国的先进人物为争取民主，曾经历了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寻求真理。开始是向英国学习，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，一些改良主义者就以英国为典范，介绍西方的议会制，提倡实业救国。以后是向日本学习，如康有为、梁启超发起戊戌变法，就是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。再后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，主要是向英国学习，他的政治理想是仿照欧美之法，创立合众政府。但是孙中山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，没有广泛宣传和介绍资产阶级政治思

想，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。

以陈独秀为首的启蒙思想家继承了前人未完成的事业，继续向西方寻求真理，他们主要是向法国学习。

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《敬告青年》，就将欧洲与中国、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，处处赞扬近世欧洲的文明，特别是法兰西文明。紧接着的第二篇文章，就是《法兰西与近世文明》，说近代有三大文明：“一曰人权说，一曰生物进化论，一曰社会主义”。“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，世界而非法兰西，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”。陈独秀最向往的是人权说，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发布的《人权宣言》。“人人于法律之前，一切平等”的说法深深地吸引着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。以人权做武器，仿效法、美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则是当时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愿望，也是他们在中国提倡民主的根本所在。正如陈独秀所说：“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，必弃数千年相传之专制的个人政治，而易以自由、自治的国民政治。”

《新青年》在力倡民主的同时，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是科学。陈独秀在《敬告青年》一文

中指出：“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，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，若舟车之有两轮焉”，“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，羞为浅化之民也，即急起直追，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”。所谓科学，既包括自然科学，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，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，尊重科学规律，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。科学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，迷信盲从，愚昧无知，简言之就是蒙昧。因而《新青年》开办不久，就同当时流行的鬼神迷信之说展开了一场斗争。

封建专制政治和鬼神迷信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，越是国势衰危之时，鬼神迷信之说越盛行。辛亥革命失败后，复古势力在进行复辟活动的同时，还大力宣扬鬼神之说。1917年秋，上海竟有一帮封建文人，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鬼之理、仙佛之道的迷信团体“灵学会”，并出版《灵学丛志》，公然宣称“鬼神之说不张，国家之命运遂促”。《灵学丛志》第1期发表了丁福得的《我理想中之鬼说》一文，说人死了变成鬼，鬼是有形有质的，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禽兽的眼睛是能看见的等等。“灵学会”一成立，立即得到当权者的支持，黎元洪为《灵学丛志》题词，严复等一批封建专制的拥护者纷纷致函祝贺，使得这股妖风越刮越大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陈独秀、钱玄同、鲁迅等人在《新青年》连续发表专文和杂感，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。

陈独秀写了《有鬼论质疑》，向有鬼论者提出了 8 个他们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
钱玄同的文章号召说：“青年啊，如果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个人，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个国，那么，赶紧鼓起你的勇气，奋发你的毅力，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！”

鲁迅发表文章指出：“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，最恨科学，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，能教人思路清楚，不许鬼混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论的人的对头。”又说：“据我看来，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，那种孔圣人、张天师传言由东来的方法，是全不对症的，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，——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。”

经过这次较量，有鬼论者统统败下阵来。

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相当敏锐地看到，在中国要倡导民主与科学，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严重地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伦理道德——孔孟之道。于是他们勇敢地喊出了“打孔家店”的战斗口号。从 1916 年初开始，《新青

年》连续发表文章，猛烈抨击儒家的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。三纲学说是西汉时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学提出的，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，维护封建制度，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。

1916年1月15日，（新青年）第5号发表陈独秀（一九一六年）一文，揭露儒家三纲之说。指出君为臣纲，则臣是君的附属品，无独立人格；父为子纲，则子为父的附属品，子无独立的人格；夫为妻纲，则妻为夫的附属品，妻无独立的人格。这完全是奴隶的道德。三纲教义的根本，是阶级制度，所谓名教、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、明贵贱的封建制度。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，与纲常阶级制度根本对立。存其一必废其一。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破除，中国的政治、法律、社会道德，就无法走出黑暗进入光明。

同年10月至12月，陈独秀在（新青年）连续发表《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》、《宪法与孔教》、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》等三篇文章，对康有为等人要把孔教定为国教，写进宪法的论调进行了驳斥。文章指出：孔教别尊卑，重阶级，事天尊君，为历代帝王所利用。袁世凯帝制虽然失败了，可是康先生很怕人们丢掉帝

制根本思想，所以仍然在那里锐意地提倡。信教自由已成为近代政治之定则，把孔教定为国教，就等于强迫国人信教，不但不能行之本国，也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的人民。《宪法与孔教》一文指出：现在的宪法是根据欧洲法制之精神制定的，而这种精神是以平等人权为基础的。如果宪法上订有尊孔的条文，那么其他的条文都可以不要了。

针对尊孔逆流，李大钊也连续发表了《孔子与宪法》、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》等文章。李大钊尖锐地指出：孔子是数千年的残骸枯骨，将此残骸枯骨进入现代国民精神结晶的宪法，那么这种宪法就是陈腐死人的宪法，而不是我辈生人的宪法。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。专制不能容于自由，将孔教载入宪法，是专制复活之先声。

在反对孔教的斗争中，鲁迅的小说和杂感等文学形式，和陈独秀、李大钊并肩战斗。1918年5月，鲁迅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这也是他开始用鲁迅的笔名射向封建礼教的第一支投枪。在《狂人日记》中，鲁迅借狂人之口，愤怒地揭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

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继（狂人日记）之后，鲁迅又在《新青年》随感录栏连续发表 10 余篇短评，批判封建礼教。他还在《每周评论》上，同庚言的笔名，发表了《敬告遗老》、《孔教与皇帝》、《旧残的威力》等随感录，对孔教及尊孔派进行批驳。

五四前期，同尊孔逆流、封建礼教进行斗争的著名人物，还有四川的吴虞。吴虞是四川新繁人，早年曾留学日本，长期在成都教书。1916 年底，他在四川看到《新青年》上刊载陈独秀和易白沙写的《孔子平议》等批孔的文章后，写信给陈独秀表明自己的见解，并将所写的文章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寄给陈独秀。陈看后对吴很赏识，并把他的文章刊登在《新青年》第 2 卷第 6 号上，以后吴虞便在《新青年》上不断发表文章。吴的文章，言词激烈，猛烈地攻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，特别是对儒家提倡的教、悌予以无情地鞭笞，他认为儒家的以孝、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、家族制度联结之根，因而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宗法社会，不能前进。吴虞的言论，曾轰动一时，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，被

胡适被誉为“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，被陈独秀誉为“蜀中名宿”。

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，奋笔直书，在破除封建礼教、奴隶道德、宗法观念，树立国民的独立人格，树立个人本位主义方面，做出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努力。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，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逐渐地深入人心。

### 3. 反对封建八股 发动文学革命

八股文是 15 世纪到 18 世纪中国封建王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。八股文每篇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部分组成。“破题”共二句，说破题目的要义。“承题”共三句或四句，承接破题的意义而加以说明。“起讲”概说全体，为议论的开始。“入手”为起讲后入手之处。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这四个段落，才是正式的议论，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。在这四个段落中，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，共合有八股，所以叫做八股文。

清代科举，继承前朝，以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和八股文体为标准。凡是考中举人和进士的

人，可以做官和享有社会特权。因此，那时的知识分子，都拼命去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做八股文章。

清代八股文，不仅盛行于科举考试，而且影响当时文化领域，文坛日趋摹尚。在封建文人眼里，只有古诗、古文、辞、赋才是文学的正宗，并为少数人所专有，至于为“下等人”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，像戏曲、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左道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清末以来，要求变革的志士仁人，早已不满这种现状。倡导“诗界革命”的维新派诗人黄遵宪写诗讽刺道：

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纸研。  
六经字所无，不敢八诗篇。  
古人弃糟粕，见之口流涎。  
沿习甘剽窃，妄造丛罪愆。

可以说切中时弊。以后革命派陈天华则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等妇孺皆能上口的文字。1904年陈独秀主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推广白话文。有些人还提倡拼音文字，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，等等。但这些举动的影响都不很大。

直到 1917 年 1~2 月间，胡适、陈独秀先后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、《文学革命论》时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才开始了。

胡适，1891 年生于安徽绩溪。1910 年到美国留学，入康奈尔大学农科，不久改读文学。1915 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，师从杜威学哲学。他在这年 9 月 17 日赠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：“梅生梅生毋自鄙，神州文学久枯馁。百年未有健者起，新潮之来不可止。文学革命其时矣，吾辈誓不容坐视。且复号召二三子，革命军前仗马箠。鞭笞驱除一车鬼，再拜迎入新世纪。”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胡适进行文学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决心。

这时，陈独秀和胡适并不相识。一个在美国哥伦比亚，一个在中国北京，但他们都在思索着中国的文学改革问题，因此一经书信往来，便成为好朋友。1916 年 2 月 3 日，胡适看到《新青年》后写信给陈独秀说：“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，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，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，有所观摩，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。”6 月，胡适与友人任鸿隽、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，明确提出：今日之文言是一种半死的文字，而白话是